

## 坚持正确历史观、宗教观与传承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史学

宋月红

**【内容提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史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历史底蕴和历史依据，其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生成、延续和变革的历史观，融入、内化到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变动之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产生以前的历史观中，存在着宣扬历史是神造的、天命的意识和观念，诸如神权的历史观、天命的历史观，掩盖、否定历史的本质和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思想根源和理论根基，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这一科学历史观，推动其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引领中华文化在历史问题、宗教问题上以具体的历史的科学态度树立正确历史观，确立正确宗教观。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就是要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史学 历史观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简介】** 宋月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sup>①</sup>，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思想根源和理论根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sup>②</sup>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史学以浩如烟海的史料、汗牛充栋的史著、源远流长的史论，记录、承载着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发展史，也秉持和彰显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朴素的历史认知和无神论思想。这与马克思主

①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2页。

② 《龚自珍集》，曹志敏注说，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61页。

唯物史观关于历史科学具有高度契合性。其中，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的起源和演变、在历史变迁中的地位和影响，是历史观蕴含的重要历史逻辑和文化理念，并影响到对历史文化的传承发展、对历史的研究和编纂。为此，深刻领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sup>①</sup>，特别是“第二个结合”，需要深刻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无神论与宗教观的内在机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史学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人民至上，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史学在历史观、宗教观上的演进和发展

历史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历史观则是关于认识研究、编纂传播历史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历史观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相互契合和融合，但又是居于基础性地位的。对于个体人生来说，欲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必先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对于国家、民族和社会来说，欲有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和文化观，也必先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史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历史底蕴和历史依据，其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生成、延续和变革的历史观，经由史书、史论而积累沉淀并记载编纂下来，成为历史文化的重要标识和载体，融入、内化到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变动之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传入中国以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史学经历中国古代和近代史学发展，既是中华历史文化遗产发展的重要内容 and 载体，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确立和发展的历史文化底蕴与基础条件。中国古代史学在先秦时期，主要以神话传说和文字记载而发生和存续，既有传承祖先改造大自然和发明生产生活方式的故事，又有记述上古历史、地理、文化、民俗等多种的内容和形式，特别是具有史学性质的《尚书》《春秋》《左传》等，形成一些具有奠基意义的史学传统，例如在史学观念上有崇尚“如笔直书、书法不隐”的求真精神。秦汉以来，以西汉司马迁为代表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文化理念，以唐代刘知几和清代章学诚为代表形成和发展了以“史德”为首的“史家四长”之说，凝练为“良史工文”的学术风格，在先秦史籍的基础上完成了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史”并留存于世。中华近代史学则以进化论推动了人们认识和研究历史，提出“史界革命”“史学革命”等，指出“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sup>②</sup>。以此为发端，中国古代史学逐步向近代史学转变。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个人之生命极短，人类社会之生命极长，社会常为螺旋形的向上发展。”“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赅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其专述中国先民之活动供现代中国国民之资鉴者，则曰中国史。”<sup>③</sup>又如章太炎，认为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4页。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另一种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年，第291页。

③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岳麓书社，2020年，第1、2页。

“惟通史上下千古”<sup>①</sup>。这些研究和编纂以历史著述和典籍为载体，记载有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历史文化之道，阐释有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其研究和编纂贯通性地记载了中国历史、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从古及近的演变发展史，形成一系列史论，从中提炼出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认知具有积极进步意义的丰富理念，从历史的角度记述并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例如，研究编纂以通史性著述反映和彰显了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以多彩多样的体裁体例与方法体现了在研究编纂上的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以立足和面向全国各民族的历史文化，以及中外关系为研究编纂的主要对象与历史内涵，体现了中华各民族集文化融为一体的统一性、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和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以及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和对文明交流互鉴的追求与贡献。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文化、中华文明记述与传承作出的积极贡献和发挥的进步作用。

然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产生以前的历史观中，存在着宣扬历史是神造的、天命的意识和观念。此为神权的历史观、天命的历史观，掩盖、否定历史的本质和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正如中国马克思主义伟大先驱李大钊所指出的：“古昔的历史观，大抵宗于神道，归于天命，而带有宗教的气味。”<sup>②</sup> 如何对待宗教等社会历史现象，如何看待天命、神权等思想观念，是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相对立的重要显著标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史观对待和处理人类社会历史的重要分析方法。1919年7月，列宁在《论国家》中指出：“为了解决社会科学问题，为了真正获得正确处理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一大堆细节或各种争执意见所迷惑，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这个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sup>③</sup> 这一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而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对待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一种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推动历史观由旧到新的变革，使得在历史问题、宗教问题上，以具体的历史的科学态度树立正确历史观，确立正确宗教观。1922年4月4日，《晨报》发表《非宗教者宣言》，倡导“作非宗教的宣传运动”<sup>④</sup>。1923年9月—1924年上半年，李大钊发表《史观》，指出“神权的、精神的、个人的历史观，多带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的倾向，而人生的、物质的、社会的历史观，则多带进步的历史观的倾向”，前者称为旧史观，后者则称为新史观。对此，他强调，“吾侪治史学于今日的中国，新史观的树立，对于旧史观的抗辩，其兴味正自深切，其责任正自重大”<sup>⑤</sup>。随着历史观由旧到新的更新，人生观也由“悲

① 《章太炎来简》，《新民丛报》1902年第13号。

② 《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7页。

③ 黎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45页。

④ 《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9页。

⑤ 《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21、323页。

观、任运、消极、听天”代之以“乐观迈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及无神论在推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史学特别是进步历史观、宗教观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广泛传播和应用，推动中华文明开辟新纪元。

## 二、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引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并扎下根来，推动引领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史学在内的中国历史文化演进和社会变革。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进程中，作为一支重要学术、文化和理论的力量，不仅接受、传播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酝酿、探索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发展进程。同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不断推动处于并参与这一历史发展之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史学特别是中国社会历史观、世界观、民族观、宗教观、文化观的变革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

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社会接受并广泛传播和应用这一科学理论，用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sup>①</sup>中国先进分子在开始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并十分注重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结合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进而逐步走上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道路。李大钊在1919年8月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中就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sup>②</sup>李大钊“夙研史学”，“历在北京大学、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讲授史学思想史、社会学等科”<sup>③</sup>。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李大钊发表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史观》《史学概论》《史学要论》等系列历史理论著述，传播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史学传承发展的思想性、制度性变革，如提出“历史是社会的变革”<sup>④</sup>，构建什么是历史、历史观、历史学，怎样研究和编纂历史等。他指出，唯物史观所取的方法，目的是“为得到全部的真实，其及于人类精神的影响，亦全与用神学的方法所得的结果相反。”在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问题上，强调“生长与活动，只能在人民本身的性质中去寻，决不在他们以外的什么势力。”“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sup>⑤</sup>。在如何认识历史的问题上，他指出，历史是“社会的时间的性象”，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1页。

② 《李大钊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页。

③ 《李大钊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01、297页。

④ 《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462页。

⑤ 《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78、280页。

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历史的唯物论者观察社会现象，以经济现象为最重要”，“经济的要件是历史上唯一的物质的要件”，“假如经济一有变动，那些政治、宗教等等生活也随着变动了”；历史是社会的变革，“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sup>①</sup>。在坚持什么样的历史观问题上，他指出唯物史观在史学上的科学价值十分重要，对人生的影响十分紧要，我们必须对它有“一种新人生的了解”，“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sup>②</sup>。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及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等问题展开；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国史稿》、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历史哲学教程》、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中国民族简史》、侯外庐的《中国思想通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等，在推动中国近代史学变革并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中，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国历史具有奠基性的代表性成果，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发展提供了重要历史文化底蕴和研究成果。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sup>③</sup>。1939年10月，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指出党的建设的任务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集中十八年的经验和当前的新鲜经验传达到全党，使党铁一样地巩固起来，而避免历史上曾经犯过的错误。”<sup>④</sup>之后的延安整风运动，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和理论武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一了全党思想、意志和行动。党在此基础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新中国即将成立前夕，1949年7月1日，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成立，其《暂行简章》号召“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sup>⑤</sup>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规定“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sup>⑥</sup>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乃至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在历史研究和历史观上，从根本意义和全社会实现了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来认识和处理中国历史与实际问题的，伴随新中国建设和发展而蓬勃开展起来。

不仅如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相契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及其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的历史文化底蕴。李大钊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前，

① 《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9、437、462、525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8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14页。

⑤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简章》，《人民日报》1949年7月2日。

⑥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1页。

就初步具备了在什么是国情、什么是真理等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契合的思想认识观念，并形成与天命、神权观念的对立。1914年11月，他在《国情》一文中说：“言国情者，必与历史并举，抑知国情与历史之本质无殊，所异者，时间之今昔耳。昔日之国情，即今日之历史；来日之历史，尤今日之国情。”<sup>①</sup>关于真理问题，他强调：“余信宇宙间有独一无二之真理。此真理者，乃宇宙之本体，非一人一教所得而私也。”“真理乃自然的因果的，宗教传说乃神秘的迷信的。故吾人与其信孔子，信释迦，信耶稣，不如信真理。”<sup>②</sup>正是在这一思想认识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不断传播，并确立对待历史文化的正确立场和政策主张。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质。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sup>③</sup>而后，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sup>④</sup>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离不开对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历史的尊重和研究，以探求对真理的追求，在推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中赓续和弘扬历史自信和主动精神。

### 三、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坚持其所蕴含的历史观

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最坚实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蕴含独特的历史观。这是概括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的深厚历史依据和历史理论基础，是从历史思维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凝聚磅礴力量的重要思想基础和精神源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历艰难探索而开拓的独特道路，这条道路不是自然的社会演进过程，而是在谋篇布局、总体规划、分步推进的历史主动精神引领下不断开创、深化和拓展的。这一历史主动精神，源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并为这一伟大实践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体现出历史决定性与主体选择性的有机统一，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历史主体能动地把握历史规律所展现出的一种精神品质。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① 《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9页。  
② 《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44-24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07-708页。

属性，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彰显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

在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毛泽东在1956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就是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也引导和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特别是坚持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力推进了记述、研究和编纂中国历史及其与世界历史的关系，促进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在中国历史、中共党史、新中国史的研究编纂中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史学，广泛而深入地探索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科、学术和叙事话语体系。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从新中国成立和建设的具体实际出发，叙述和总结了党的30年历史。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发展，科学溯源党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的《当代中国》大型丛书，从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系统乃至其自古以来的起源、演变和发展，把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和“历史中国”结合起来，深刻记述和揭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白寿彝的《中国通史纲要》《中国通史》和当代中国研究所组织编写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和1—4卷），以及中国历史研究院正在组织编写的《新编中国通史》，在已有史学研究成就的基础上深入推进中国通史的研究编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编写的党史学习教育读本《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改革开放简史》《社会主义发展简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在研究编纂上贯通、融合起来，深刻揭示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性成就和基本经验，推动党和人民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坚持正确宗教观。宗教工作是一个关系党的执政前途和命运的全局性和战略性工作<sup>①</sup>。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从指导思想上就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无神论，以及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深刻把握坚持人民至上，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加强民族团结和保持社会稳定，更好团结信教群众、夯实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形成共同致力民族复兴的强大力量<sup>②</sup>。

（下转第93页）

①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81页。

② 《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 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新疆》，《人民日报》2022年7月16日。

要继续帮助其巩固已有思想成果，防止反复。一是要有专门的人继续关注其思想动态，一旦发现其思想波动，及时帮助。二是要做好环境净化工作，刚摆脱邪教精神控制的转化者，就像刚出生的婴儿，抵抗能力极弱，既要提示其本人远离未转化的邪教人员，也要教给其应对邪教组织拉拢的办法，以免再次中毒。三是运用“消退训练”的原理，重建融洽的环境。如笔者在山东烟台市调研的案例：为消除雷某某转化后对社会的恐惧和回避心理，帮教过雷某某的志愿者联系当地社区，帮助雷某某找了一份家政工作，重新恢复与社会的联系渠道；并联系其家人，引导其丈夫等家庭成员接纳包容，让她拥有宽容向上的生活氛围，有助于她重新树立正确的思想信念，融入正常社会，真正摆脱“全能神”邪教的精神控制。

被邪教“全能神”迷惑的人员，逐渐失去理性和自我。只有针对其因痴迷邪教而形成的崇拜、感恩、依赖、惧怕、对抗等心理进行引导，采取科学有效的帮扶办法，如“心理疏导”“提升内驱力”“树立无神论思想”“培养科学精神”“意识重构”等，他们才能恢复理智，回归社会，彻底摆脱邪教“全能神”的精神控制，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责任编辑：张 戈)



(上接第 14 页)

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从其历史观上就是要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守好中国式现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认识把握、研究编纂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史特别是其中的宗教工作和宗教关系史，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无神论和宗教观，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相结合中，坚持以党认识宗教问题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方针、基本原则，做好宗教工作的基本方法、基本举措为指导，推进研究编纂宗教中国化发展史。聚焦人民历史主体地位、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研究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的，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不竭源泉，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民立场、人民愿望、人民创造、人民智慧，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时代新征程上研究编纂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史，就是要在指导思想和历史观上，坚持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定不移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责任编辑：秋 影)